

村官贿选已成
密，如果直选镇长
民主的基础与前提是
的政治觉悟与素质，在中
一旦与金钱直接挂钩，民
成了金钱的代言人与开路

舆论监督的权
演绎为舆论暴力？

倘若媒体公然与一
盟，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
可能的暴力来源已经失
力。

村民集体上访
博弈游戏？

城中村违建，在一
是官商勾结而产生的怪胎
候穿着几件“老百姓的
因为在关键时候，他们
护农民利益”的旗帜，
民上访闹事。

民意在哪里？

民意有时候完全是一
伪装的民意甚至成了个别
块可有可无的“遮羞布”
前中国，“被强奸”的民
特色”的民主一样，已经
集团最好的保护伞。

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媒体发挥“**社会矛盾减震器**”的作用
减缓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为体制进化赢得时间和空间
争取以最小的民生代价赢得社会民主政治的最大进步

◎ 杨桂荣 著

挂 职 手 记

一个记者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桂荣，传播学硕士，羊城晚报主任记者。广东首批新闻媒体下基层挂职锻炼采编人员。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挂职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任镇党委副书记。现任国家文化示范基地羊城创意产业园副总经理。

顺致读者：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未尽兴，诸位不妨到微博空间一聚，凡拍下此书封面照片者留言必复。
博址：羊羊羊通讯社<http://weibo.com/ycwbqiqi>。

本人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自觉地探索政府宣传的“软着陆”策略，绝非刻意去为政府部门涂脂抹粉文过饰非，只是希望从传播策略方面着力，通过找到一个政府和民众以及媒体舆论都可以接受的“最小公倍数”式的平衡点，减少社会不必要的震动与颠簸，以此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公共管理成本，从而以一种相对温和而“不折腾”的方式推动社会民主进步。

——杨桂荣

摄影支持：壹城视效 谭 军
《太和中国》印鉴：林书杰



新闻媒体是当下社会森林中的啄木鸟。媒体这只啄木鸟只有不断叼出树上的害虫，社会森林才有可能持续保持健康，至少不至于彻底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媒体要能够护卫社会森林，就要力求独立于公权力和工商界，而以监督不良政商势力为己任。正如杨桂荣所说：“倘若媒体公然与一切豪强势力结盟，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媒体对一切可能的暴力来源已经失去了监督的动力——甚而媒体本身就已经成为权贵豪强中的一分子”。

——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胡舒立

与国际经验不同，中国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不是以民间社团，而是以大众传媒所勾连的“积极公民”或曰“公共人”为主体。如何通过传媒用理性和批判性来组织公众审视公共事务，也就是发展基于媒体的审议民主，在杨桂荣的这本书中多有精彩的论述和睿智的思考。

—— 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展江

媒体必须充当“社会矛盾的减震器”，以推动社会向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这一极富意义的看法，向人们证实了媒体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信息公正而顺畅的流通来联结不同群体，以创建一个通过积极性妥协而达成的和解环境，而不是相反。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后会同意这一简明而又不可或缺的建言。

—— 知名本土文化批评家 杨小彦

ISBN 978-7-218-07194-7



定价：38.00 元

◎ 杨桂荣 著

挂职 手记

——一个记者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挂职手记 / 杨桂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18-07194-7

I. ①挂… II. ①杨… III. ①干部培养—中国—文集
IV. ①D6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7410号

挂职手记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谢海宁

装帧设计: 刁俊锋 黄隽琳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7194-7

开 本: 787 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40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倘若此书能为政府官员与媒体记者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提供一点参考,能为一切探索当前中国体制性出路之良知公民提供一点启迪,则幸甚。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杨桂荣





这两年中国与世界局势都处在巨大的变动过程当中，至今尚未结束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扩散，使这段时间变成不寻常的时代。中国在重新审视其面对的世界，世界也在重新认识已经越来越深深置身于全球化经济过程中的中国。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是折射中国和世界之关系的晴雨表。在这里，伴随着移动媒体的普及，瞬间迅速传递的各种信息流把传播全球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宏观方面，关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走向，每天都有新的议论和话题；微观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信息的全球化传播中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生活表象纷繁复杂，如何从中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日常生活挑战不断，如何恰当理解，以有效应对？一切社会活动从本质来说，都可以理解为传播活动。这是因为，社会活动过程不可能离开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在不断产生和刺激着信息需求和要求传播的愿望。任何社会活动过程都包含着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正是从传播出发，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才能最终落实为具体个人的发展，从而强化个人的社会认同、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心，最终社会化过程得以完成。

在信息传播中流动的中国当代社会，是由无数基层的个人组成的，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进的各种新的社会制度在各个生活领域当中的建设或创新，基层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在媒介化的当代，无一不被视为传播问题；基层工作的质量与传播的关系极其密切，在相当多的时候，传播活动决定了事件的产生、发展及结果。

本书所记载的是作者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挂职过程中对媒体与政府之博弈关系的思考评论，这不仅是一个资深记者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标本。

作者是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就有过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优秀记录，也曾在国内重要学术论坛上做过大会发言。经过系统的传播学理论学习后，作者在十年前来到省级报刊从事新闻

工作，报道的主要领域主要围绕着城市建设、市政工程和环境治理，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有过深入了解。现在，挂职工作改变了作者的参与身份，能够直接以一线管理者的身份来贴近现场基层工作，从而在如何体现具体的社会管理责任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作者所呈现的这本挂职期间的思考手记，显然是把新闻报道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结合起来的一种深度思考。

作为一种随笔性的思考札记，作者把工作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转换成一种流动性的系统思维，形散神聚。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接触处理种种日常信息的过程中保持了在中国传统中非常可贵的道义担当，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努力将这一认识贯穿到工作实践当中，把基层工作与媒体工作、政府工作与群众沟通结合起来，主动应用专业知识，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媒体功能和角色进行积极的换位思考和实践尝试，并提出“媒体是社会矛盾减震器”这样有创见的看法。

作者明确提出，当前的媒体尤其需要有政治的远见和智慧，要调控社会矛盾，培育理性民主，竭尽所能让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不要过于剧烈，为当前体制的改革与进化赢得相对宽裕的时间与空间，要争取以最小的民生代价赢得社会民主政治的最大进步。这种能够把敏锐的政治触觉和积极的社会责任心相结合的勇气和精神无疑体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贵的品质和追求。

是为序。



2010年12月26日

（序言作者陈卫星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传播学家）



前言一

观察，思考；
体验，感悟；
摘录，传播……

最后，一本30多万字的《挂职手记》，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低调一点，这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作业”，一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在“基层大课堂”里完成的思考作业。

2010年3月2日，在广东首批新闻媒体下基层挂职锻炼采编人员座谈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同志给30位即将出发的媒体同行布置了这样一份“作业”：

第一要学习，第二要磨炼，第三要好好感悟，砥砺品质，完善自我……

于是，在大约一年的基层挂职期间，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在帽峰山下和龙湖边，本人随心所欲，“吾手写吾心”，记下了一些思想的火花——或解读时政，或摘录妙文，最后结集成章于此。

如是而已。卑之无甚高论。

前言二

【著者小启】前言二就是附录于下的一篇小文章，摘录于此，别无深意，惟为读者节约时间与金钱——如果读者能够站着在书店里看完此小小前言，则此书之大意已了然于胸，无需读者诸君破费了。

调控社会矛盾，培育理性民主 ——关于当下媒体之社会责任与政治智慧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体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要特别强调“讲政治”。具体操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调控社会矛盾”和“培育理性民主”。

“培育理性民主”需要通过“调控社会矛盾”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并为体制的“转身”赢得空间和时间，从而实现社会进化成本之最优化；而社会矛盾之调控是否及时有效，最终又有赖于我们能否通过启迪培育民智，从而尽快建立起一套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的理性民主的社会管理制度。

一、舆论公器的权力也可能沦为舆论暴力

很多资深的媒体同行应该都已经意识到，今天的媒体已不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进行“有闻必录”的“傻瓜式照相机”了，它已经深度介入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核心——历史完全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或者不报道而改变其发展方向。

在当前社会民主氛围的进一步推动下，媒体作为社会舆论公器的威力无疑将变得更加强

大——但是，当媒介的权力与影响日益扩张的同时，媒体从业人员的操控智慧与责任意识是否得到了同步提升？如果媒体没有相应的政治智慧与社会责任作为依托，在一些事关社会发展方向和民众长远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一个是清醒而坚定的认识，而只是为掌控着这样一种公共权力的利器而窃喜，甚至满足或沉醉于利用这一社会赋予的公共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小单位的私利，那么，舆论公器的权力随时可能沦为舆论暴力，权力也就可能意味着灾难！而且，权力越大，灾难就越大。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案例中发现可资参考的内容。由于缺乏足够长远的政治智慧的导引，舆论界的率先失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

1990年上半年，前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的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主旨。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俄国而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拥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

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二、“讲政治”考量着媒体人的责任与智慧

说起政治，我们媒体界有很多同行可能马上会想起政客甚至流氓，然后满脸鄙夷地对它避而远之。事实上，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政治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名词，相反，良好的政治令人无限向往——依本人之见，好的政治，就是一种让最大多数人生活得很幸福很和谐的社会管理智慧。

而作为舆论工具的新闻媒体，同样也是管理这个社会的众多手段之一。在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今天，如何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和善管媒体？如何让媒体工具的合力与最大多数的民众意愿尽可能地无限接近？这不仅考量着执政者对新闻媒体的调控管理能力，也考量着媒体掌控者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

如果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日常面对每一条新闻素材的处理中，能够摆脱自身观念与利益的局限，也能够从自身所在的媒体本位中跳脱出来（让新闻不必“为广告与发行而折腰”），真正尽可能地站在最大多数人之最长远利益角度来考虑（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智慧），来组织稿件的语言与结构，来摆弄稿件的标题与版面，让每一份稿件最大可能地贴近真相，由此促进政府改革，推动社会稳健进步，则善莫大焉！如果每一位新闻记者都能在日常处理新闻素材中不自觉地贯彻此种觉悟，则完全可以实现毛泽东当年那句“政治家办报”的愿望了。

三、寻找“苏珊大妈”需要媒体提高政治素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今年在与媒体记者见面时两次提到“苏珊大妈”。

汪洋要求：“……要真正把广东的‘苏珊大妈’、‘苏珊大哥’、‘苏珊大叔’、‘苏珊大婶’的意见充分反映出来，需要媒体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

显然，寻找基层的“苏珊大妈”，就是寻找基层民意的真正代表。能否找到“苏珊大妈”，能否辨别真正的民意（为执政者决策提供参考），需要一线记者“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也考量着各大主流媒体之掌舵者的政治智慧。

民意在哪里？民意的真正代表在哪里？是聚焦一时的“口罩男”吗？还是下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墨镜男”或“鸭舌帽男”之类？民意，多大层面的民意，或者具有何种广泛程度的民意应该引起媒体与政府的重视与关注？甚至应该因此而改变政策的方向与初衷？作为民意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媒体记者无疑也应该是这一问题的思考者——因为“选择就意味着立场”！版面就是观点！

四、“讲政治”不等于唯命是从做“传声筒”

在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条件下，中国高层希望媒体能够保持一定的舆论监督威力，鼓励媒体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望通过媒体的监督批评来创造一种民主进步的改革氛围，由此实现“经常搞搞震，没有大地震”的社会矛盾调控目标。

事实上，我们经常强调媒体应该“接受党委的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这种“接受”应该讲究传播的艺术并尊重传播的规律，而不是傻乎乎地搞异口同声甚至亦步亦趋一唱一和。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和而不同”——简单地做上级党委或政府部门的“传声筒”，那是

一种很低层次的“鹦鹉学舌”，我们经常讲要“与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应该可以有新的理解，那就是“不尽相同，但却可以查漏补缺使之更加完善”，这才是真正和谐意义上的“高度一致”。

五、媒体保持相对独立才能实现有效监督

从当下中国媒体的竞争态势来看，与政治结合，借政治影响而扩张经济（当然包括提高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扩大社会知名度等），已经成为媒体实现自身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可以从国内某传媒集团全方位发展，同时与政界高层频频互动中揣摩一二。

但需要提醒的是，媒体在与政治（或经济）结合的过程中，也要谨防操之过急，否则其结果可能因小失大，在失去独立品格的同时也影响了其社会责任与政治效能的发挥——举一个并不完全典型的案例：不久前，某某报系对自己与某某电网（现有既得利益的行业代表）之间的战略合作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自称“强强联手”、“合作共赢”等等（参见国内媒体之相关报道），颇有几分类似于“权贵之间互相攀附然后还要在一起公开炫耀的味道”。这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媒体自身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众所周知，媒体的相对独立是实现其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前提，倘若媒体公然与一切豪强势力结盟，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媒体对一切可能的暴力来源已经失去了监督的动力——甚而媒体本身就已经成为权贵豪强中的一分子，它完全可能沦为一种潜在的舆论暴力，或其他体制性暴力的帮凶。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应该始终记住，从最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最大的政治还是“为人民服务”（当前主要是为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民众

服务）——如果忘记了这个最大的政治前提，却趋炎附势热衷于攀结社会名门权贵，媒体最终可能因小而失大，最后将在事实上沦落为一小部分豪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舆论打手”。

六、讲政治包括“培育理性民主”和“调控社会矛盾”

“培育理性民主”需要通过“调控社会矛盾”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并为体制的“转身”赢得空间和时间，从而实现社会进化成本之最优化；而社会矛盾之调控是否及时有效，最终又有赖于我们能否通过启迪培育民智，从而尽快建立起一套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的理性民主的社会管理制度。

当前中国媒体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要特别强调“讲政治”，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培育理性民主”和“调控社会矛盾”——套用体制内常用的语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培育民主，启迪民智，营造适合民主制度诞生与发展的公众土壤，这是当前媒体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也是本人（作为广东首批新闻媒体下基层挂职锻炼采编人员之一）在接触当前基层民主直选政治试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重要体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下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村社政治生态，正是民主这颗相对先进的“优良种子”，在中国农村这“贫瘠的土壤”（主要指农村地区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相对落后等）中开出来的一朵“小花”（当然，应该强调说明的是：“土壤何罪”？唯管理者“耕作无方”而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下媒体“培育民主启迪民智”之紧迫与必要。

至于在民主前加入“理性”二字，主要是提

醒我们在追求和培育民主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理性，有所选择，避免盲目和狂热——中国曾有过这方面的血的教训，具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敏锐性的媒体人尤其要牢记前车之鉴。

至于“调控社会矛盾”——即本人一贯提倡应发挥当前“媒体是社会矛盾减震器”的作用，它与“培育理性民主”乃一个硬币之两面。在当前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山露水，通过媒体来引导舆论从而调控社会矛盾，使之得到合理释放而不是激烈爆发，为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赢得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为实现理性民主提供一个相对和谐而低成本的路径环境。

综合言之，“培育理性民主”需要通过“调控社会矛盾”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并为体制的“转身”赢得空间和时间，从而实现社会进化成本的最优化；而“社会矛盾之调控”是否及时有效，最终又有赖于我们能否通过培育启迪，尽快建立起一套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的理性民主的社会管理制度。

七、培养一支讲政治的新闻队伍乃当务之急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不久前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做大做强主流媒体，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事业发展能力和传播能力”。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其途径与方式或许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当前看来，培养一支讲政治的新闻采编队伍成为首要任务——尽管网络时代人人皆为记者，但培养一支成熟而稳定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主流媒体的采编队伍仍然非常有必要，因为所有的正规新闻产品之采集编发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如果这支队伍的政治觉悟高了，能够始终自觉地与中央决策层保持高度一致（“高度一致”不是唯命是从，而是“和而不同”，甚至“小骂大帮忙”等），始终自觉地以最广大民众之最长远利益为一切新闻传播工作之出发点，则胜过万千新闻管制政策。

再进而言之，如果每一个新闻记者都能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具有统一而清醒的认识，都能够在日常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以“培育理性民主，调控社会矛盾”为使命，一起温和而“不折腾”地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朝着民主文明的方向“碎步而稳健”地前进，岂不最好？

桂荣于广州帽峰山下

2010年12月16日

目录

2010年1月	历史是一切偶然之后的必然	002
	我，和我参照的记录方法和思考向度	004
	轮到中国摆阔了吗？	005
	中国困境的突破路径	007
	政府/民众/媒体的集体博弈	008
	寻求促进政民良性互动的平衡点	011
	媒体自身智慧的考量	013
	一个政府部门跑线记者的职业定位	015
	面对舆论困境时的“软着陆”	017
	媒体要提高对民意鉴别的智慧	
	——对汪洋谈“苏珊大妈”的解读	019
2010年2月	不折腾：我的新闻立场与政治立场	022
	中国特色：媒体记者=“御用记者”	022
	当前传媒与政府关系的精准表述	024
	希望新闻学：阴霾过后要有灿烂阳光！	027
	异想太和	028
	重申本人的新闻立场：坦荡而温和的“不折腾主义”	029
	如何对跑线单位进行批评报道？	030
	朝上看是为了抓住机会	031
	媒体记者的挂职意义：培养“社会矛盾减震器”之调控手？	032
	帽峰山赚点眼球之畅想	034
	尊重民意还是尊重科学？	035
2010年3月	在省委宣传部挂职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草稿）	038
	座谈会“放炮”受肯定	040
	重新崇拜雷锋，要比崇拜金钱好得多！	042
	“虽然很难，但你一定要坚持！”	043
	从此成了组织的人	044
	挂职第一天	045
	好的政治应该是自下而上生长的	046

寻找与辨别民意考量着媒体的智慧	048
村官贿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果直选镇长会怎么样？	049
民主是中国转型的必要参照，但却不是照本摹攀的绝对典范	050
第一次下村的初步感想	052
垃圾焚烧：谁在博弈，谁在受伤？	055
参加第一次班子会议	056
如果政府依靠强权“搞定”民生焦点，最终将人亡政息！	057
中国社会间歇性处于“补课”或“回炉”阶段	057
基层的政治生态堪忧：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度持续降低	058
“下访”的多了，上访的自然就少了	061
人大报告内容强调之处，正是其职能缺位之处	062
基层代表呼吁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	063
让政治的形式变得更活泼些	064
基层政府：矛盾重重的夹心饼	065
一切政府决策均要尊重民意	066
经济的背后就站着政治	068
假如我可以决策，坚决不搞“杀人式的拆迁”！	069
2010年4月 如何解决李坑垃圾焚烧厂历史遗留问题	072
舆论监督的权力如何不被演绎为舆论暴力	073
如果基层没有坚硬的政治堤坝，民主可能像洪水一样可怕！	074
自来水公司送太和一个灯，太和永远来买你的油！	075
开发帽峰山，建设和龙湖	
——打造太和门户	076
谁应该站在处理社会矛盾的第一线	077
政府官员不用总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079
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的距离有多远	080
村民集体上访：一场政治博弈游戏？	081
为挂职手记内容的公开提前表示歉意	083
文化宣传工作与综合维稳	084
从水淹杨箕村看广州“水浸”整治	085
如还没有练成夹着尾巴做人的功夫，就不要爬得太高	086
重建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088
道德标准异化致使基层官员“高危”	090
有想法是一切行动的开始	091
是先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092
2010年5月 校园安保升级是天价维稳的继续	094